

大鲁迅传

倪墨炎 著

(第一部)

一岁至二十二岁

1881—1902

绍兴 南京

013065159

K825.6
1005

大鲁迅传

倪墨炎 著

(第一部)

一岁至二十二岁

1881—1902

绍兴 南京



北航

C1672609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K825.6

100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鲁迅传.第1部/倪墨炎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3

ISBN 978-7-208-11486-9

I. ①大… II. ①倪… III. ①鲁迅(1881~1936)—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1665号

责任编辑 杨柏伟 周 珍

特约编辑 卢润祥

封面设计 杨钟玮

大鲁迅传(第一部)

倪墨炎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381,000

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1486-9/K·1994

定价 58.00元

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



本书宗旨

不唯上，不唯书，要唯实。

自序

在整理好《大鲁迅传》第一部全部正文后,我就回过头来写这篇自序了。之所以要写自序,是为了与读者沟通:我写这部《大鲁迅传》的愿望、设想,写作的经过,我所要表达的认识,写作中的感受。

一、关于书名的解说

大鲁迅传,可以有两种读法:大鲁迅的传,大的鲁迅传。笔者认为,鲁迅是现代当之无愧的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,因而可以简称为大鲁迅;正因为是大鲁迅,他的传记就应该而且可以写得详细些、广泛些,可以多角度地叙述他的人生历程,可以较为全面地介绍他的作品和思想,可以写成大的鲁迅传。

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。(1)鲁迅以他丰富多彩的创作,在我国数千年的文学历史的时空中,像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关汉卿、罗贯中、曹雪芹那样,是群星灿烂中的一颗。(2)《阿Q正传》等作品,也是世界的不朽名著。(3)鲁迅的有着深广的社会内容的小说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,记下了所亲身经历的历史横断面的散文《朝花夕拾》,舒述了对社会对历史的饱含哲理的见解和深情的散文诗《野草》,取历史题材发表新鲜观点的已被人们习惯地称为“历史小说”的《故事新编》,都是我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,是前所未有的文学体裁上的创新,也是供后人学习和发展的典范作品。到了晚年,根据短兵相接的需要,他又创造了新的文学体裁——杂文。他为自己为他人写的序跋,也极富创意。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史料翔实,议论精辟,是我国现代撰写文学史和各种文学体裁史(散文史、诗歌史、杂文史等等)的开山之作。一个文学家伟大不伟大,不在于他重复前人的做法,写了多少卷

帙浩瀚的著作,而在于他的作品有多少创新,能给世人提供多少前所未有的新鲜作品,因而也就起了推动文学史发展的作用。(4)鲁迅作品在我国各民族中的广泛传播,所产生的广泛影响,至今是任何作家所无法比拟的。这是鲁迅的殊荣。

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。(1)作为文学家而又是思想家,人们当然首先注意他的文学思想。鲁迅从留学日本时起,直到晚年,始终坚持“为人生”的文学观,并在文艺界和读者中,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(2)自新文化运动以后,通过小说、散文、散文诗、论文、杂文,深入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,实际上也就总结了民主革命在中国的成败得失,显示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度与广度。(3)1927年以后,他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,通过小说(如《理水》、《非攻》等)、论文(如《门外文谈》等)、杂文(如《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吗?》等)、诗歌(如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等),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。这是在黑暗的岁月里,给人以力量的哲学思想。(4)他的思想,与时俱进,经历了两次“飞跃”——从封建士大夫家庭培养出来的读书人,“飞跃”而成为民主主义者;从民主主义者“飞跃”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,形成了“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”。许多人愿意在这条思想发展道路上,步鲁迅之后。在有的人看来,思想家必须有庞大的思想体系,有系统的等身著作,这或许是不错的,但在笔者看来,像鲁迅那样以自己的思想和思想道路,在同时代人和后人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的,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家。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:是否只有搞哲学的才能成为思想家,搞经济的、搞教育的、搞文学的都不能成为思想家?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家都不能成为思想家,那我国自古至今还有哪位文学家可以算是思想家呢?

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。(1)我们习惯于把政治领袖称为革命家,如毛泽东、周恩来。读中外历史,知道还有群众领袖的革命家、宗教领袖的革命家,等等。鲁迅不能与这些革命家挂上号,因而有人认为他不是革命家。其实,鲁迅自有他作为革命家的特点。(2)有的朋友说,你要看看鲁迅自己是怎么说的。如他说:“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”(《呐喊》自序)可见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家。但是,这只能说:他不是政治领袖或群众领袖的革命家。他又说:“凡做领导的人,一须勇猛,而我看事情太仔细,一仔细,即多疑虑,不易勇往直前,二须不惜用牺牲,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(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),也就不能有大局面。”(《两地书》八信)“不愿别人作牺牲”,他还在别的场合说过。正因为此,他不能成为政治领袖的革命家,他特别不能成为

搞暗杀、丢炸弹之类的革命家。但他并不反对武装斗争。他支持民族革命战争和社会革命战争。他曾去学医,“预备卒業回来,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,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,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”。他在《两地书》中曾多次赞扬北伐战争的胜利。鲁迅还说过,他的作品,“既然是呐喊,则当然须听将令”。(《呐喊·自序》)“可以说,是‘遵命文学’。不过我所遵奉的,是那时革命先驱者命令,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。”(《自选集·自序》)既然“须听将令”,他当然也就不是革命家。然而,历史事实是:没有人向鲁迅下过“写什么”和“怎样写”的命令,他的所谓“须听将令”,是指须遵奉当时革命主流意识之命,是指在思想上与革命先驱者们保持一致。世上没有人会自称“革命家”的。鲁迅自称“须听将令”,和他自称“小兵”、“一卒”是一致的。鲁迅在上海时,蒋介石搞流氓政治,枪杀了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佛,一时白色恐怖严重,国内外友人对鲁迅处境表示关切。鲁迅 1933 年 6 月 25 日致山本初枝的信中说:“只要我还活着,就要拿起笔,去回敬他们的手枪。”这类话,鲁迅在别的地方也说过。这表明鲁迅的战斗武器是笔。这正是他参加革命斗争的特点。他实际上是以“拿笔”为特点的革命家。(3)中国革命由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组成。鲁迅是文化战线的革命家。毛泽东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,称鲁迅是“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”,“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”。据胡乔木回忆,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说:“我们有两支军队,一支是朱总司令的,一支是鲁总司令的。”^①鲁总司令即指鲁迅。毛泽东是政治领袖,通晓中国国情,作为一家之言,他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,是值得重视的。(4)再看鲁迅的革命实践。鲁迅是从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。在日本、绍兴期间,他投入了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民主革命运动。在新文化运动中,鲁迅第一个以小说形式指出了“礼教吃人”,呼吁“救救孩子”。鲁迅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反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,支持和参加民众的爱国的革命运动。在“三一八”惨案后,他发表了《纪念刘和珍君》,极大地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,并将反动派永远地钉在“历史的耻辱柱”上。当段祺瑞、章士钊等军阀政客下台之时,林语堂、周作人等人表示要对他们实行“费厄泼赖”,鲁迅发表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必须缓行》,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,指出必须“痛打落水狗”,发扬革命到底的精神。林语堂、周作人等人当时表示接受鲁迅的批评,林语堂还画了一幅“鲁迅痛打落水狗”的

^① 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》第 259 页,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初版。

图,插印在他的《翦拂集》中。这都表现了在文化战线上,鲁迅已是领军人物。在新文化运动中,鲁迅是民主主义启蒙者,但他并不感到“救亡”压制“启蒙”,而是“救亡”充实了“启蒙”的内容,更明确了“启蒙”的方向。他因此被北洋政府撤去教育部佥事的职务,还被列入拟通缉的名单(这份名单后未被采用),但鲁迅决不屈服。(5)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派,在沪、穗等地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,鲁迅毫不犹豫地站在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一边,不再与国民党合作。在上海,他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政权的斗争,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,并成了这三盟的领袖人物或中坚成员。在反动派屠杀包括左联五烈士在内的龙华二十四烈士后,鲁迅冒着生命危险,发表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,将国民党反动派牢牢地钉在“历史耻辱柱”上,同时也鼓舞了革命者继续战斗的斗志。当反动派在军事“围剿”取得一些进展后,就在上海等大城市发动文化“围剿”,查禁了革命作家的作品,查禁了鲁迅的几乎全部的著作,鲁迅领导左翼作家、进步作家沉着应战,出版了不少地下和半地下的书刊,斗志尤坚,收获巨大。他确实是一位文化战线上的“鲁总司令”。(6)他的不屈的斗争,被称为“硬骨头精神”,被誉为“民族的脊梁”,逝世后被认为是“民族魂”。正因为他是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而又是伟大的革命家,人们才会给予他这么多的尊称誉称。

那么,鲁迅是何时成为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的呢?这似乎也有不同的说法。笔者认为是在新文化运动开展之时。有人说:鲁迅在日本加入了光复会,已是革命家,已具备革命家的“本色”。这恐怕不大合乎历史事实。鲁迅在日本,主要学习日文、德文,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,学习医学,学习《说文解字》学习民主主义的许多著作;他想办文艺杂志,开展文艺运动,但没有成功。他还没有发表有影响的著作,也没有重大的革命举动。他在日本时,已是一位思想上成熟的民主主义者。接着他在绍兴这座文化名城中,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全过程。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,引起了他的深沉的思索。新文化运动使他在思索的沉默中爆发,他成了新文化大军的领军人物。

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,应包括哪些内容,好像还没有人全面、系统、深刻地论述过。这应该是鲁迅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任务。有人如果认为鲁迅算不上思想家,或算不上革命家,最好也能阐述其理由。只有这样的切磋争论,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长进。

笔者很浅薄,只能写几条提要式的看法,希望能抛砖引玉。我是赞成鲁迅是伟大的

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的说法的,所以我写《大鲁迅传》。

二、实现多年的愿望

在党诞生九十周年之际,我长期工作的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老干部处约我写篇文章。写什么内容呢?约者说:谈谈你对党的认识,写写你入党以来做过哪些有意义的事。我就写了篇《我做过哪些有意义的事》,被编入一部厚厚的大书《岁月见证》,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。上海出版界许多人为这部书写了文章。写这篇文章,使我钩沉了许多回忆。

我于1933年11月11日出生在绍兴城北三十里的姚家埭。这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农村水乡小镇。这里有两家百货店、三家茶馆、三家中药铺、一家饭馆、三家豆腐店、两家固定的水果摊、三家理发店、一家南北货店、一家茶食店、两家酒店、一家棺材店、一家建材店、一家邮政代办所、一家星期天“做礼拜”的教堂。这里有早出晚归的开往绍兴城、斗门镇的埠船,有开往萧山的夜航船。早晨有渔民、农民挑来的河鱼、海鱼、各种蔬菜参加集市,参加集市的还有熟肉摊、羊肉摊、油炸臭豆腐摊、糕点摊等等。集市常常人头济济,约于早晨五六时开始至上午十时逐渐散去。

我家住在小镇和农村的结合部。再从我们几家台门往北走,就是大片农田,再就是农村了。镇上多数人家经商,也有子女在上海、杭州做工经商的。我父亲在萧山一家百货店里当账房。1940年日本飞机轰炸萧山,我父亲的商店直接被炸弹命中,幸亏人都在外边。父亲是空手回家的,失业了。他在自家的门口开了个杂货小店,勉强可以糊口。他几乎每天都闷闷不乐。1943年11月的一天晚饭后,他感到胸闷难过,在房间里坐立不安地走了一会以后,坐在椅子上,竟像睡着似的去世了。他时年四十八岁。母亲就继续做小买卖,养活了我、她自己及祖母一家三口。抗战胜利后1946年,我小学毕业了,母亲在万分艰难中节衣缩食,给我读初中。我永远感激母亲对我的养育。

我们姚家埭镇,与鲁迅外婆家安桥头,相距约四五里路,如果从我家后门走田间小道约三里路。据周作人的日记和回忆文载,鲁迅、周作人青少年时期都到过姚家埭。他家在姚家埭附近有亲戚。周作人去南京求学,就是与亲戚一起在姚家埭乘夜航船出发的。因而我在《中国的叛徒与隐士:周作人》一书中特地有一段文字写姚家埭,实在因为它也是我的家乡。我在幼小的时候就知道鲁迅、周作人、周建人三兄弟的名字,但没有读过他

们的书。在初中时,我才读到鲁迅的作品。

1949年绍兴解放了,这年我正好初中毕业。我已长大了,我开始懂事,我要谋求工作,以使祖母和母亲不再劳累地干活。1950年夏,我到了上海。那时真是百废待兴,邮局招考、新华书店招考,我都去报了名,我又在报上看到“上海市立陆行中学招生”的启事,说“本校设有人民助学金”。我决定去考,录取了,邮局、书店就不去了。我写信告诉母亲,母亲复信表示同意。我靠人民助学金读了高中、大学。我家及近亲中没有人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,我是坐享了革命成果。

高中一年级起,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字,稿酬是我平时零花和每年一次回家车旅费的唯一来源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在当中学生时,写的文章是不少的。不久前,我在网上看到两篇文章在议论我高中二年级时写的一篇文章。原来香港出版了一本关于《文汇报》的书,其中写到了我的这篇东西。我没有保留这篇文章的剪报。依稀记得,我当时读到关于“小商小贩小买卖每时每刻都在滋生着资本主义”的经典名言。我想,我母亲做小商小贩,为了一家人糊口,但当然是唯利是图的,我一定要警惕被个人主义所侵蚀。这篇文章表现了一个中学生对经典名言似懂非懂的惶惑心情。我还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文,学校团委还表扬了我。我又写了一篇“中学应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”的文章,寄给《青年报》,报社编者包启新先生作了修改到陆行中学来找我。他原以为是一名教师写的,不料是一名学生。他改得很好,增加了不少内容。我要求两人一起署名发表,他答应了。包先生后来调到少年儿童出版社任编审,我已在出版局工作,我们成了经常见面的同行。我还在《新民报晚刊》上发表过不少诗歌短文,但一篇也没有保存剪报。也就在高中二年级时,我从旧书摊上购得一本艾芜的《文学手册》,连夜读了,真是豁然开朗,我一下子获得了很多文学创作的知识,并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。我就开始练习写小说,这一直延续到大学。第一篇又像小说又像散文的文字,三四千字,发表在《解放日报》的《朝霞》上。第二篇小说,八千多字,我寄给了浙江的《东海》文学杂志,过了个把月,编者来信说是拟用,我正在热切地盼望有我作品的杂志寄来,却收到了退稿,原稿上已有不少红笔的改动,编者附信说:稿件已经发排了,但被认为是“写中间人物”,因而抽下来了,你能否写写工农兵的英雄人物、先进人物。我读了信,真哭笑不得,心想:鲁迅不但写中间人物,还写落后人物呢,没有什么限制,却写出一个鲁迅。我正在起草又一篇小说,一万多字,是写一个农村的能人——做酒师傅,他用一根竹筒在酒缸

外面听,就能听出缸里的酒是否已酿成,是写得很有趣的。但“做酒师傅”也不能算是英雄人物、先进人物,我就不再写下去了。写小说的激情过去以后,冷静下来,我决心还是研究鲁迅。读鲁迅的著作,我总感到亲切;鲁迅所写的人物,我总感到熟悉。

大学毕业后,我留校工作。1960年由市委宣传部和市委组织部联合发出红头文件,把我调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当编辑。其实我是很不愿意离开母校的,两边的工资完全一样,大学里有寒假、暑假,不坐班,大学的图书馆借书又方便。父亲曾对我说过:“长大后要学会一种吃饭本领,吃太平饭,不要从政。”他说的当然是指旧社会的“政”,但他的话还是对我一生起了作用。我不大谋求什么官职,只想做些研究工作,争取当个教授,要实现这样的心愿,留在母校实在是很合适的。但我是党员,当然得服从组织调配。1976年我被出版总署借调到北京,参加《鲁迅全集》的编注工作。1978年回到上海,局党委把我留在机关里,后来很长时期我在主持出版局图书处的工作,并兼职创办和主编《编辑学刊》。六十岁以后,我负责筹办成立《书城》杂志社并任主编,后又兼在韬奋纪念馆任职。六十五岁以后,我退休了,图书处又返聘我,直到八十岁,让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
我在岗位上的工作,特别是图书处的工作,是很忙碌的。鲁迅研究完全成了业余的事。我的业余时间,也就是每晚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以后,即七时半至十时半共三小时,再加上星期天的时间。在这样有限的的时间里,我做了这样几件事:

(1) 搜购旧书。相当多的星期日上午,我都到旧书市场去转一圈。我搜购的旧书,以关于鲁迅的书为核心,然后辐射至关于周作人的书^①,关于陈独秀、李大钊的书,关于钱玄同、刘半农、林语堂、孙伏园的书,关于许寿裳的书,关于胡适、陈西滢、梁实秋、徐志摩、邵洵美的书,关于韦素园、台静农、韦丛芜、李霁野、曹靖华及王冶秋、李何林的书,关于蔡元培、傅斯年、顾颉刚、李小峰的书,关于高长虹、尚钺、向培良的书,关于许钦文、章川岛、罗家伦的书,关于冯雪峰、柔石、魏金枝的书,关于成仿吾、郁达夫、张资平的书,郭沫若有关的书,夏衍有关的书,周扬有关的书,关于巴金、茅盾、叶圣陶、黎烈文、吴朗西、郑振铎的书,等等,等等。我还收集了大量与鲁迅有关的丛书,如《乌合丛书》、《未名丛书》、《奴隶丛书》、文化生活版《文学丛书》、《良友文学丛书》等等。我还收集从鲁迅生前到新中国成立前夜出版的研究、回忆鲁迅的书,我搜集到的就有第一本台静农编的《关于

^① 这里的“关于周作人的书”,完整的说法应该是“周作人和关于周作人的书”,为省篇幅而简化。下同。

鲁迅及其著作》(1926年未名社版)到《鲁迅与语文改革》(1949年4月时代出版社版),共六十四种,全部收集齐全大概只缺一二种了吧。我不是收藏家,是为研究而收集相关的旧书的,但我持之以恒。

(2) 搜集旧杂志和注意剪报。许多重要文章,发表在报刊上,未必出书,必须收藏。20世纪50年代,华山路徐家汇口有家旧报刊店,论斤收进,论斤出售,任您在灰尘扑扑的报刊堆里挑选。襄阳路淮海中路以南,有三家旧书店,也经常出售成套的或零散的旧杂志。淮海中路重庆南路口有家旧货商场,出其后门向右拐,有家石库门,里面常出售旧书旧期刊。福州路上海旧书店开有旧报刊门市部,楼上是解放前成套旧杂志,楼下是近年期刊,《文艺报》试刊号及创刊后的几期,我都是在这里买到的。此报刊门市部在“文革”后一度恢复经营,约在80年代停业。我收藏了不少旧杂志,并有数十册剪报。“文革”以前,淮海中路和四川北路邮政大楼对面,设有邮局的报刊门市部,常可买到几天前的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以及上海的报纸。有一次我在福州路购得两张《越铎日报》,一张已缺损四分之一的版面。可惜这两张报是鲁迅离开绍兴后出版的,与鲁迅无关,但在我的收藏的报纸中,可说是文物了。

(3) 抄录了几十册重要史料。真正的历史、文学史,是在当年的旧报刊中。但旧报刊极难收购,特别是旧报纸,很少出现在旧书摊头。图书馆收藏有旧报刊,只得去抄。不但我自己抄,夫人陈九英、表弟程克华也都帮我抄。借调在北京的两年期间,我常与各大学注释组的成员一起到北京图书馆抄资料。像当年《京报》上刊载的《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》,就是从东皇城根大街那座报库中抄到的。从这条消息知道,所谓“五十人名单”并不是段祺瑞政府第二个通缉令名单,而是他们在制订“第一个通缉令”过程中弃而不用的几个名单之一。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报刊中,上海图书馆在植物园对面的报库中,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(原是中华书局图书馆)的报房中,我都抄了许多史料。这些史料是我订正史事、揭穿谎言的重要依据。

(4) 在大量搜集史料的基础上,我也写了一些单本著作。计有:1.《鲁迅旧诗浅说》,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出版,印数记得是十万册。由于我比较注意诗本事的探索,对不少诗篇的解说比较合乎诗人原意,因而受到了臧克家、周振甫、张向天、许杰等先生的好评。因许杰先生喜欢这本书的写法,就请他写序,由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再版。接着又出版了增订本。2001年改名为《鲁迅旧诗探解》出版。2.《鲁迅与书》,由赵家

壁先生写序,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。3.《鲁迅革命活动考述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。4.《鲁迅后期思想研究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。5.《鲁迅署名宣言与函电辑考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4月出版。6.《现代文坛偶拾》,学林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。我收藏的书,以鲁迅和关于鲁迅的书为核心,辐射开去而搜集的中国现代的书也不少。我开始写点书话随笔类文字。因投稿关系,逐渐联系上了《人民日报》第八版《大地》编者姜德明先生。他真正是藏书家,又是道地的书话作家。我在借调到北京工作的两年中,经常去访问他,就在他们报社的食堂吃饭,晚上常常坐在天安门前的石阶上,谈我们的畅想曲。他写的散文极佳,特别是写人的散文,他的《相思一片》,我每篇都读过几遍,此书得过全国散文奖。有一次我问他:你最喜欢写的是哪类文字?他毫不犹豫地说:“书话!”有一次他还如痴如梦地对我说:“我们能不能在上海或苏州或绍兴,去开一家旧书店,收购进来的旧书我们先挑选,一定能得到很多精品。”我说:“我们放弃了在职的工资,靠买卖旧书能赚得回来吗?而且现在房租又那么贵,可能经营下来,连房租都付不起。”我们只好相对哈哈一笑,算这支畅想曲已经唱完。但在老姜的鼓励之下,我也不断地写起书话来了。7.我又将发表在报刊上的书话随笔編集起来,名为《现代文坛随录》,请老姜写序,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。8.我写了几年的《中国的叛徒与隐士:周作人》,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0年7月初版。因周作人是个复杂人物,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一名闯将,是有其不可忽视的业绩的,可他后来在民族战争中失节,成了人们不齿的人物。我写的是中国第一部周作人传,因此引起了众多的人关注。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文艺报》、《文汇报书周报》及许多杂志、学报发表了肯定性、赞誉性的评论,或摘刊我书中的片段。该书两年之内印了三次。胡乔木同志读了该书后,给我写来一封长信。他在信中说:“你用了很大的苦功写成的书是值得看的。你搜集的资料很丰富,我看后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或不清楚知道的事。你也尽力做到有好说好,有坏说坏。你的努力没有白费。”乔木同志对书名和一些具体内容提了意见。在乔木同志逝世时,我写了篇《胡乔木谈周作人》的文章在报上发表,以为悼念,并全文公布了他的信。此信已编入《胡乔木书信集》,我的文章也被编入《回忆胡乔木》(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出版)和《我所知道的胡乔木》(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出版)。我的这本周作人传记,经增订,改书名为《苦雨斋主人周作人》,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。9.《现代文坛散记》,又一本书话随笔集,请袁鹰先生写序,由上海

三联书店 1992 年出版。10. 再一本书话随笔集《现代文坛短笺》，学林出版社 1994 年出版，由雷群明先生写序。11. 《现代文坛灾祸录》，是一本国民党政府查禁图书、查封书店、密令“取缔”左联等团体的史料集，和作家、书店怎样巧妙地与反动派周旋斗争的一些记录。由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出版，六个月后再版。12. 《倪墨炎书话》，是姜德明主编的《现代书话丛书》之一种，北京出版社 1997 年出版。13. 《现代文坛内外》，《书友文丛》之一种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8 年出版。14. 《文人文事辨》，曾卓主编《跋涉者文丛》第二辑中的一集，武汉出版社 2000 年出版。15. 《鲁迅与许广平》，是继《中国的叛徒与隐士：周作人》之后，又一本人物传记，与陈九英合写。写法上与《周作人》那本不同，也是一种尝试。由海婴先生写序一，刘绪源先生写序二。2001 年 1 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初版，6 月二版。中央电视台邀我参与《携手同行：鲁迅与许广平》的拍摄工作，编导马侃先生对我说：“我们读了几本同类书，觉得你这本写得最好，征求一些专家的意见，也说你这本写得最好。”16. 《鲁迅的社会活动》，是在原《鲁迅革命活动考述》和《鲁迅署名宣言与函电辑考》两书的基础上，经补充、修改而成。有些内容是新写的，如对所谓《鲁迅茅盾致红军信》，首次提出是没有经过鲁迅起草、过目或事先知情，很可能是在瓦窑堡红军中的一位同志执笔的。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 月出版。17. 《真假鲁迅辨》，是一本鲁迅研究的论文集，是我过去的著作中篇幅最大的一本，字数五十二万三千余，2010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除了这十七本著作外，我还编了《书友文丛》，收入夏衍《风雨故人情》等十九种；与陈九英合编鲁迅同时代人回忆鲁迅的一套书，已出版许寿裳、郁达夫、许广平、周冠五、许钦文、冯雪峰等的六种；又编《名人看名城》丛书，收入《绍兴：桥乡醉乡》等六种。

我所编著的书，都直接间接与写《大鲁迅传》有关。《真假鲁迅辨》尤其与《大鲁迅传》有关。我写这本书，花了四年时间，推迟了《大鲁迅传》的出版日程，但还是值得的，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很重要：

(1) 我考证了鲁迅生平中重大事件的历史真相。如鲁迅没有起草或过目或事先知情所谓《鲁迅茅盾致红军信》；如段祺瑞政府没有制订过通缉包括鲁迅在内的“第二个通缉令”；如南京国民政府没有通缉过鲁迅，等等。也考证了鲁迅生活中一些不小的事情，如鲁迅在广州不是住白云楼的南端而是北端；如殷夫《孩儿塔》插图为何真容难现；如国画《如松之盛》不是鲁迅作品，等等。

(2) 我研究并指出了:鲁迅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是弄虚作假。我举出铁的事实:鲁迅有些作品被作了不合史实的注释,有些手稿被涂改后发表,有些照片被剪贴后出版,有些故居被改变后开放,关于他的不少回忆录是虚构的。在我国古今名人中,鲁迅是纪念馆最多的名人,可是哪个名人会有像鲁迅这样的不幸?在新的历史时期中,有人继续弄虚作假,动辄将数十人捆绑在一起,贴上“挑战经典”、“挑战鲁迅”、“颠覆鲁迅”等标签,自己则拉起“保卫鲁迅”、“传承鲁迅”、“对鲁迅信徒般虔诚”等等的大旗。对于信口开河、错误百出的著作,因为是“自己人”,则吹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其实,这些标签、大旗和吹捧,说的是假话、大话、空话,而且十分霸道,形成“假、大、空、霸”的作风、学风和文风,不但严重干扰了鲁迅研究的正常发展,甚至还严重干扰了新版鲁迅全集的书信部分、旧体诗部分和部分日记的编注。稍有是非观、正义感的人,对这种现象是不会袖手旁观、熟视无睹的。

父亲曾嘱咐我“不要从政”,我自己也并不想“从政”,但人生道路并不由自己定的,我还是在政府部门当一名正处级干部。这一档次的干部,社会上真多如牛毛,但在党的指引下,多少也做了些有意义的事。如叫我自己度量,在我所做的工作中,最有意义的倒是业余的鲁迅研究。我出版了《真假鲁迅辨》,这是何等有意义的人生快事。写《大鲁迅传》,梳理鲁迅一生的各方面的情况,更是实现我多年的愿望。

三、本传的写作特点

怎样写好《大鲁迅传》呢?采用什么样的文字格局?采用什么样的文字体例?采用什么样的文字节奏?我都反复考虑过。我曾试写了几节,自己看看,觉得不行。后来我明白,先要决定两点:(1)本传记的读者对象是谁?是写给谁看的?读者对象应该是:大学中文系师生,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,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,鲁迅及其同时代人研究者,业余爱好者。这业余爱好者的面是很广的,但其文化水平应该是较高的。(2)内容决定形式。我要全面反映鲁迅的思想、著作、社会活动、家庭生活,每节的篇幅不可能太单薄,文字节奏不可能太轻快,文字格调必须是沉重(那是苦难的岁月)、凝重(许多史事需要深沉地思考)、庄重(出于对传主的衷心的敬仰)的。于是我写出了现在的体例,先写出几节,请友好看看,他们认为这样写较合适。

本传从内容上看,有哪些特点呢?